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产业发展研究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 2015 年学术年会”观点综述

方志斌

(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本文对中国工业经济学会 2015 年学术年会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产业发展”研讨会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了总结,会议集中就新常态下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产业转型与升级、政府职能与企业行为、创新驱动与新兴产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反映了新常态下中国产业发展的最新实践以及产业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提出了诸多的政策思路与建议。

[关键词] 新常态; 产业转型升级; 政府职能; 创新驱动

[中图分类号]F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6)02-0156-05

2015 年 11 月 6—7 日,由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主办、厦门国家会计学院承办的“中国工业经济学会 2015 年学术年会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产业发展’”研讨会在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隆重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山东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大学、暨南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天津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浙江财经大学、安徽大学、辽宁大学、云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湖南科技大学、天津工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广西社会科学院、上海海关学院、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等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共 300 余人参加本次论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王稼琼教授主持开幕式,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党委书记、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张军博士致辞。会议由主题报告会和分组报告会两个板块构成。主题报告会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王稼琼教授和江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廖进球教授主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郑新立教授,原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铭清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长吕政研究员,天津财经大学副校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于立教授分别就“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怎样认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和“产业组织、企业组织与产品属性”作主题报告。本次年会共收到 100 余篇学术论文,与会代表分组就“新常态下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新常态下产业转型与升级”“新常态下政府职能与企业行为”“创新驱动与新兴产业发展”等专题分组进行深入而激烈的讨论,效果显著。

[收稿日期] 2015-11-20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网络经济时代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研究”(批准号 FJ2015B197)。

[作者简介] 方志斌(1977—),男,福建云霄人,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电子邮箱:zbfang@xnai.edu.cn。

一、新常态下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中国经济呈现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将给中国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但也使其面临巨大的挑战。如何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与会学者就新常态下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产业组织的发展趋势、市场的界定与分割、经济自由与企业成长等方面展开讨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郑新立教授作了题为“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的主题报告。他指出,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为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国产业经济领域应着重探讨六个问题:①如何避免由经济持续下行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保持中国经济在“十三五”期间的中高速增长?②如何围绕处理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来创新宏观调控?③如何鼓励自主创新,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支持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水平?④如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释放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巨大潜力?⑤如何改变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城乡区域之间供给严重不协调的问题,特别是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⑥如何建立生态文明体制,通过壮大环保产业,实现绿色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长吕政研究员作了题为“怎样认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矛盾”的主题报告,他重点给出六个方面的论述:①中国经济运行的矛盾从总体上判断是供给不足的矛盾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共存,且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更为凸显。②中国目前在制造业方面仍具有比较优势。当前中国出现工业企业招工难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教育结构不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以及现行教育政策、就业政策和分配政策事实上引导劳动者脱离实体经济、脱离工农业体力劳动。实际上,从劳动力供给总量考察,并不存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中国劳动力成本和工业用电价格等生产要素价格低于发达国家,中国制造依然存在明显的比较优势。③当前的科技进步并非处于突飞猛进的阶段,而是处于一种循序渐进的阶段。因此,不应该把经济增长寄托在因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而产生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上,而应当重视对现有产品及其生产技术的改进和革新。④中国制造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明显,主要体现在工业物化劳动消耗占比高、劳动生产率低、工业创新能力不高、国际知名品牌企业少等诸多方面。因此,可把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作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⑤中国社会再生产的流通过高,抬高了产品的终端价格。可以通过优化生产力的空间布局、建立高效协同的物流管理体制、用社会化大生产方式改造生产运输组织、加强物流企业信息化建设、引导综合型电商与专业型电商协调发展等多种手段降低商品的流通成本。⑥以工业化与城镇化促进农业的发展。通过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的有机构成、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社会化分工和培训农民等工业化的方式发展农业;通过创新产业发展方向、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促进“三条线、一大片”的发展模式等方式推进农民“不进城”的城镇化。

天津财经大学副校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于立教授在“产业组织、企业组织与产品属性——产业经济学的几个现实问题”的报告中提出,要用“三位一体”的思维模式来解决产业经济学存在的现实问题,即“产业组织、企业组织、产品属性”三位一体。针对产业经济学存在的现实问题,他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①目前产业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在进行竞争政策审查或反垄断执法时,对行业市场竞争状况评估不够准确,即产业划分或市场界定不够清晰。在做行业竞争状况评估时,可以采用简易方法、常规方法、特殊处理法等进行产业划分或市场界定。②国有企业必须分

类,不能只按一个模式运作。建议采用“两线三区四分法”把国有企业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政府企业,这类企业无独立法人地位,政企合一,不独立核算,企业管理者由政府官员兼任或委派,以生产“共用品”为主,产品价格与成本无关;第二种是特殊法人企业,这类企业具有法人地位,政企适当分开,基本独立核算,国家独资或控股,从事自然垄断和政策性垄断业务,主要生产“准共用品”或某些特殊的私用品,产品价格与成本相关;第三种是股份公司企业,这类企业依照《公司法》运作,具有普通法人地位,政企分开,国有经济或政府参股或控股,依照标准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管理经营,生产“私用品”。③产品的属性可以分为四类:私用品、共享品、公用品和共用品,政府应根据产品的属性制定合理的反垄断政策。

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郭晓丹副研究员在论文《经济自由与工业企业成长:中国证据》中指出,总体上,经济自由对企业的成长具有微弱影响,具体到外资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经济自由对企业成长的解释力明显增强。要素市场、价格决定、政府干预等方面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均对企业成长有促进作用。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企业成长“随机性”的观点,即企业的动态更多依赖于内生的企业特征(规模、年龄等)。江西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吴昌南教授在论文《中国汽车产业区域市场分割对汽车产业成长的影响》中对中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汽车市场分割情况进行测算,发现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分割情况较为严重。市场分割有助于汽车产业规模的增长,但对提高汽车产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要促进中国汽车产业做大做强,应打破市场分割,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汽车产业生产要素跨地区优化配置。

二、新常态下产业转型与升级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但产业的发展还没有完全从“旧常态”的发展模式中转变过来,投资驱动、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依然普遍存在,这些发展模式所积累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对于处在新常态背景下的中国,如何在经济降速的前提下实现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将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与会学者从优化产业转型升级路径、发挥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实施产能合作与扩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构建全球价值链嵌入战略等多个视角探讨新常态下中国产业的转型与升级。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余典范教授在论文《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新常态与新战略》中认为,新常态意味着新的发展环境的变化、新的动力的转换、新的发展模式的升级,需要采取新的战略来应对。①实现基本要素的升级,从依靠数量、低成本的竞争转向依靠质量、高素质要素的竞争,重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发展,注重大国市场等新竞争优势培育。②通过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跨国公司和完善创新发展的服务体系与环境来推动中国全球价值链与创新链的融合发展,提高中国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和能级。③要破除产业关联发展的壁垒,实现产业的融合发展,拓展中国产业转型的内涵与空间,从政府简政放权的纵向深入、市场化改革的稳步推进来塑造经济治理的法治化、透明化,为新常态下中国产业的升级打下坚实的基础。安徽大学经济学院王玉燕讲师在论文《全球价值链嵌入能提升工业转型升级效果吗》中认为,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加深有助于推动中国工业转型升级,但推动作用仅在劳动密集型以及高技术工业中较为显著。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高技术工业的发展、行业内竞争性的加强以及经济自由度的提升能够推动中国工业转型升级,而目前金融业的发展非但没能有效推动工业发展,反而限制了工业转型升级的推进。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白让让副教授在论文《中国乘用车制造企业产能扩张的战略性动机研究》中指出,随着跨国公司市场势力的不断增强,本土企业只能通过兼并重组、破产乃至市场退

出,消化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压力,产业政策的立足点在于激励自主品牌企业向产品、工艺和组织创新的模式转化。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陶锋副研究员在论文《金融地理结构如何影响产业转型升级》中认为,地方金融发展和区域(省会)金融中心建设对企业生产率增长均有促进作用,但二者作用各异。地方金融发展对大企业、小企业和新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均具有促进作用;区域(省会)金融中心仅对大企业和达到一定年龄的新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具有积极影响。地方金融发展对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增长作用有限,但对非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区域(省会)金融中心对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均有积极影响,但仅对规模偏大的非国有企业生产率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葛鹏博士研究生在论文《金融摩擦、资本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中基于资本错配的思想推导出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产出效率模型,考察了金融摩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证实了金融摩擦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影响。

三、新常态下政府职能与企业行为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进入阵痛期、深化改革进入深水期、前期政策进入消化期。在这种经济形势下,政府应通过职能转变,简政放权,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企业应主动适应市场环境,转型升级,提高企业效率,建构核心竞争力。与会学者认为应从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政府政策制定、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建立企业信用等方面提高政府效能与企业效率以应对经济新常态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大连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原毅军教授在论文《政府政策在绿色供应链创新激励中的作用》中探讨了在绿色供应链中生产者与逆向物流供应商结成联盟后,政府政策对纵向联盟成员产品生产的创新激励作用,证实了政府的补贴和税收政策对可再生原材料价格和产量的影响、对生产者和逆向物流供应商的创新激励,以及对整个纵向联盟的创新激励作用。中南大学商学院李晓萍副教授在论文《如何确保政府制定合意的产业政策——中国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的理论构建》中指出,面对经济的新常态,制定合意的产业政策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建议可以通过建立经济政策委员会、工业战略与产业政策工作小组、产业政策研究与咨询支持网络等方式,系统科学地进行中国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浙江财经大学中国政府管制研究院徐骏助理研究员在论文《电价管制、电力短缺与居民电力消费需求》中认为,政府难以通过实施阶梯电价来降低居民电力消费。阶梯电价的最终实施效果可能是电价上涨,但电力消费量却没有下降,居民收入增加所导致的用电量的增加只会转化为更多的电力账单支出。阶梯电价只不过是把高收入阶层的部分新增收入转化为电网企业垄断利润的一种隐性手段,并不能实现资源节约的目标。要实现资源节约的目标,应该设定一系列互相配套的政策体系。

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陈艳莹教授在论文《环境认证、企业绩效与股价效应》中指出,中国环境认证的披露是上市企业股价提升的微弱信号,而产品相关环境认证的作用占股价提升效应的主要部分。因此,应进一步激励外向型企业进行环境认证并给予高污染行业企业施行合适的认证补贴。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吴绪亮副研究员在论文《大销量竞争、质量水平差距与产品安全规制》中指出,企业采取大销量竞争确实可以提高企业的产品安全 and 质量水平,非对称性大销量竞争会扩大企业间的安全和质量水平差距,企业成本差距程度始终与企业的产品安全 and 质量水平负相关。

四、创新驱动与新兴产业发展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但大多数产业尚未占据世界产业技术制高点,中国工业仍然存在技术引进和自主开发结合不够紧密、没能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对国外技术存在严重依赖等问题。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政府要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加强区域产业协同创新,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与创新商业模式,加快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扶持“互联网+”等新兴产业,进而促进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余东华教授在论文《政府补贴、土地价格扭曲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产能过剩》中指出,政府传统干预手段加剧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产能过剩。化解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应转变传统扶持政策,根据具体问题“对症下药”,加快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进一步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提高企业新工艺、新装备和关键技术的研发制造能力,形成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动力机制,避免陷入新兴产业链上的低端锁定。北京科技大学东凌经济管理学院何维达教授在论文《经济新常态下北京市高技术产业升级研究》中以北京市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北京市高技术产业升级的薄弱环节。他指出,北京市高技术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导,产业成长与集聚能力以及创新能力明显不足。

重庆三峡学院财经学院黄玲副教授在论文《创新驱动、融资约束与科技型小微企业众筹》中指出,由于科技型小微企业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高风险性,使其在传统融资模式下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众筹融资模式为科技型小微企业解决融资瓶颈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途径。

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万兴副教授在论文《“互联网+”下企业的平台战略与绩效》中发现,第三方平台多属度能够提高影院绩效,纵向一体化程度负向调节第三方平台多属度与影院绩效的关系,影院质量正向调节第三方平台多属度与影院绩效的关系。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庄雷博士研究生在论文《“互联网+”基础投资的产业调整效应研究》中指出,互联网基础投资对地区各产业产值增长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拉动效应存在滞后;但对第一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第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第三产业结构调整没有显著影响。

Research on Chines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New Normal of Economy —A Summary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in 2015

FANG Zhi-bin

(Xiamen National Accounting Institute,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cademic contributions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in 2015, whose theme is Chines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New Normal of Economy. The conference had a deeply discussion 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Chinese industrie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government function and enterprise behavior, innovation driven and emerging industries' development in New Normal of economy. Those points reflect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put forward many constructive policy ideas and proposals.

Key Words: New Normal;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government function; innovation driven

JEL Classification: L50 H00 O38

[责任编辑:覃毅]